

# 20世纪

## 中国文学理性精神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 Shiji Zhongguo Wenxue Lixing Jingshen

朱德发 等著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参著者**(以章节先后为序)

|     |     |     |     |
|-----|-----|-----|-----|
| 朱德发 | 张光芒 | 贾振勇 | 徐文广 |
| 马立新 | 周海波 | 杨庆东 | 王 颖 |
| 余小杰 | 温奉桥 |     |     |

# 目 录

|                            |     |
|----------------------------|-----|
| <b>导论 跨文化语境的理性精神</b>       | 1   |
| 一 理性精神的多样性                 | 1   |
| 二 理性精神与文学创作主体思维            | 38  |
| <b>第一章 人文理性与启蒙文学</b>       | 79  |
| 第一节 人文理性激活主体思维             | 79  |
| 第二节 理性主导人物灵魂塑造             | 101 |
| 第三节 启蒙叙事的理性图式              | 109 |
| 第四节 启蒙理性与人性意识之演进           | 127 |
| 第五节 个案剖析:《人啊,人!》           | 139 |
| <b>第二章 政治理性与左翼文学</b>       | 150 |
| 第一节 创作主体在政治理性思维制导下的文学追求    | 150 |
| 第二节 左翼文人知识分子和政党政治          | 160 |
| 第三节 左翼文学意识形态化的理性言说         | 168 |
| 第四节 政治理性精神在左翼文学创作中的显示      | 185 |
| 第五节 个案剖析:《星》               | 205 |
| <b>第三章 正义理性与抗战文学</b>       | 217 |
| 第一节 文学创作主体思维模式的调整          | 217 |
| 第二节 弘扬正义理性与民族解放意识          | 234 |
| 第三节 打造民族英雄形象               | 246 |
| 第四节 抗战叙事的二元对立              | 260 |
| 第五节 个案剖析:《第七连》与《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 | 267 |
| <b>第四章 红色理性与革命战争文学</b>     | 278 |
| 第一节 暴力革命论统驭创作主体心理          | 278 |

|            |                  |     |
|------------|------------------|-----|
| 第二节        | 暴力革命与人文理性相抵牾     | 286 |
| 第三节        | 人物性格的极端化与政治化     | 300 |
| 第四节        | 理性化的宏大叙事结构       | 308 |
| 第五节        | 个案剖析:《保卫延安》      | 312 |
| <b>第五章</b> | <b>民间理性与乡土文学</b> | 325 |
| 第一节        | 主体意识的深层理性底蕴      | 326 |
| 第二节        | 乡土文学主题的理性内涵      | 343 |
| 第三节        | 民间理性与乡土叙事        | 355 |
| 第四节        | 艺术形象的本土化和民族化     | 368 |
| 第五节        | 个案剖析:《丰乳肥臀》      | 379 |
| <b>第六章</b> | <b>道德理性与婚恋文学</b> | 391 |
| 第一节        | 主体理念在现代与传统之间     | 391 |
| 第二节        | 主题内涵的冲突性与深邃性     | 405 |
| 第三节        | 两性搏斗于情与理之中       | 417 |
| 第四节        | 道德理性对婚恋叙事的制约     | 430 |
| 第五节        | 个案剖析:《白涡》        | 442 |
| <b>第七章</b> | <b>女权理性与女性文学</b> | 450 |
| 第一节        | 现代理性与主体女权意识      | 450 |
| 第二节        | 女性文学世界的丰富性       | 463 |
| 第三节        | 女性形象系列的多样性       | 490 |
| 第四节        | 女性叙事结构的理性规范      | 502 |
| 第五节        | 个案剖析:《莎菲女士的日记》   | 511 |
| <b>第八章</b> | <b>世俗理性与通俗文学</b> | 520 |
| 第一节        | 世俗理性与现代理性        | 520 |
| 第二节        | 言情主题的复杂意蕴        | 530 |
| 第三节        | 人物性格的理与情冲突       | 544 |
| 第四节        | 才子佳人叙事模式的变异      | 555 |
| 第五节        | 个案剖析:《玉梨魂》       | 567 |

|                       |     |
|-----------------------|-----|
| <b>第九章 非理性的“哲理文学”</b> | 580 |
| 第一节 非理性即“重估一切价值”      | 580 |
| 第二节 重感悟重体验的思维方式       | 592 |
| 第三节 文本以揭示人生哲学为指归      | 607 |
| 第四节 营造隐喻、象征森林         | 620 |
| 第五节 个案剖析：《废都》         | 629 |
| 主要参考文献                | 641 |
| <b>后记</b>             | 646 |

## 导论 跨文化语境的理性精神

### 一 理性精神的多样性

凡是有人群的地方,不论居住于地球的哪个角落,只要有头脑有思维功能,都能生成理性并凭借理性力量,维持或推进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不管你意识到或没意识到,都有一种理性精神在烛照着人的内宇宙和外宇宙,使人在与自然、社会、群体甚至自我的接触、亲和、矛盾和搏斗中减少盲目性增强自觉性,以清醒的理智力量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人的生态和人的心态总是从不平衡走向平衡、再从平衡走向不平衡,这种永无止息的合乎规律的运动,既要靠理性思维导航又要仗理性力量推进。世界上任何民族文化都是人的理智力量和实践力量创造的,是为了人的合目的合理想的生存和发展而创造的,致使理性精神在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文化语境中普遍存在着、弥漫着。文学既然是人学且与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现或再现了人的内世界和外世界的千变万化,那么文学势所必然地具有了流淌着人类理性精神的特点,即使地球上那些发展滞后的民族或人群,只要他们能思考且能以话语来表述或交流其思维成果,也不乏理性精神的播扬和流传。理性精神在人类繁衍生息、创造发展的领域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它能跨越任何文化语境撒向人间、注入人心。因此,理性精神是跨文化语境的。理性精神对世界各个民族来说不存在有无的问题,而只有优劣、精粗、真假、善恶、美丑、新旧之别。

### (一) 理性的本源涵义

对理性精神的探讨不能停留于泛泛而谈,首先应考察理性的本源含义。“理性”一词源于拉丁文 ratio,与希腊文 empeiria“经验”相对照,虽然“理性”是关于人的一个概念,是人清醒地有意识地进行判断和思维的一个出发点,但并非开始就特指科学的逻辑的思维方式。从不同时期对“理性”的不同阐释和用法便可发现这一概念的含义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内涵和外延相当复杂,具有弹性很大的阐释空间。古希腊时期的思想家认为理性是从人身上表现出来的,而它的来源却是神性的。柏拉图把理性最高境界的真善美说成来自神本体,只有来自神的力量理性才真正称得上理性。17 世纪的理性主义者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仍坚持理性来自神本体的看法,认为宇宙是“由上帝决定的理性排列的体系”。<sup>①</sup>18 世纪的启蒙理性虽然并未彻底颠覆柏拉图主义的神本体论,但主体理性却突出起来,直至 20 世纪主体理性仍是理性概念的主要内涵。“18 世纪摒弃了这种演绎和证明的方法。它不再在体系的严密和完美方面与笛卡儿、马勒布朗士、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一争短长了。他所探寻的是关于真理和哲学的另一种概念,其功能是扩展真理和哲学的范围,使它们更灵活、更具体、更具有生命力。”<sup>②</sup>在笛卡儿等的形而上学体系里“理性”是永恒真理的王国,是人与神的头脑里共有的真理王国,理性的每一个活动似乎都参与了神的本质;而 18 世纪则不同,它是在一种朴素意义上看待理性,“理性不再是先于一切经验、揭示了事物的绝对本质的‘天赋观念’的总和”,而是把“理性看作是一种后天获得物而不是遗产。它不是一座精神宝库,把真理像银币一样窖藏起

① [英]约翰·科廷汉:《理性主义者》,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第 74 页。

② [德]E·卡西勒:《启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第 5 页,第 11 页,第 12 页。

来,而是一种引导我们去发现真理、建立真理和确定真理的独创性的理智力量。”“整个 18 世纪就是在这种意义上理解理性的,即不是把它作为知识、原理和真理的容器,而把它视为一种能力,一种力量,这种能力和力量只有通过它的作用和效力才能充分理解。”<sup>①</sup>这一信念在西方 18 世纪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扎下了根。孟德斯鸠说:“我们的心灵生来就是为了进行思索,即为了理解事物的,但必须具有好奇心,因为正如万物形成了一根链条,其中每一观念都先于一个观念又尾随另一个观念一样,只要人们把握了一个观念,必定还想把握另一个。”<sup>②</sup>这种求知欲,这种科学力比多曾被神学独断论斥为理智的高傲,剥夺了它的合法权利,但 18 世纪文化的基本目的就是捍卫、强化和巩固这种思维方式。

理性作为思维方式,18 世纪没有跟随笛卡儿等先哲的思维方式亦步亦趋,恰好相反,它不是就教于笛卡儿的《方法论》,而是求助于牛顿的“哲学思维的准则”,使哲学走上一个全新的方向,即他并不像笛卡儿们先提出一些原理、概念和公理然后通过抽象推理而获得“知识”或“真理”;牛顿的方法不是纯演绎方法而是分析方法,通过观察现象研究经验材料去探求物质世界的普遍秩序和规律,即不可以先于现象去把握秩序和“理性”,而应在现象本身的内在联系中去发现规律和“理性”。对于 18 世纪方法论的革命,卡西勒作了极高的评价:“理性的最重要的功用,是它有结合和分解的能力。”理性创造了整体,“并按照自身的规则把各个部分装配到了一起,它就对自己的产物获得了完备的知识。理性理解这种结构,因为它能按其整体性、按其个别部分的先后顺序再生这一结构。”<sup>③</sup>只要理性学会把自己独特的分析解剖和综合重建法运用于某一新的、极端重要的知识领域,它就能进入这一领域

①② [德]E·卡西勒:《启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第 5 页,第 11 页,第 12 页。

③ [德]E·卡西勒:《启蒙哲学》,第 11—12 页。

并取得创新趋优的效果,文学领域无疑也是理性关注的领域,不论文学运动形态的推进或者文学理论形态、文学创作形态的建构都得力于理性的分析综合功能。

关于“理性”概念含义的阐释,除了启蒙时代所作出的理性意味着分析和综合、意味着一种能力一种力量外,托马斯·阿奎那把理性分为广义(拉丁文 *InteHectus*)的和狭义(拉丁文 *Rario*)的,前者是指与感觉相对的精神活动,是一种较高的整合性思想,既是抽象思维又有直接洞见事物本质的功能;后者是指抽象、推理、比较和区分的思维活动,与科学理性内涵相似。启蒙时代以后到19世纪末,基本上是从狭义上来界定理性,以致造成理性就等于抽象思维的误认。其实广义的理性是人的所有智性活动或者思想认识的统称,它包含狭义理性所没有的“领悟”这一中国传统思维中的极为重要的概念,它强调对本质的直接洞见。现代思想家和美学家对“悟性”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海德格尔提出的“诗意的思”当作如是解,即感受性的诗之所以能与本质性的思融为一体,其通道乃是“领悟”,这就使“理性”在文学创作中真正具有了合法性<sup>①</sup>。

## (二) 理性的一般含义

理性的一般含义与其本源含义并不矛盾。只是本源含义特指西方思想家对理性的不同界定,即对源于拉丁语的“理性”在不同的地域或不同历史时期所作出的引申发挥,前面仅仅是简略的概述;而理性的一般含义应是跨文化语境的,是不同时期不同民族对“理性”的日常理解和一般用法,有的表述直接借用“理性”一词,有的表述尽管不用“理性”而话语中已含有“理性”的意思,致使有些民族对“理性”的界定套用西方的话语,有些民族对“理性”

① 徐亮:《当代文艺学科中“理性—非理性”问题的讨论及概念清理》,《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8期。

的理解源于本土化的话语系统。但无论对“理性”的一般含义有多种理解或不同解说,它总是人之所为人的一种本体性的逻辑呈现、一种精神力量的象征。具体而论,从不同角度切入,对理性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最常见的说法有:

理性是人的思维活动方式,它包括概念分析、逻辑推理、整合思辨等。按照通常的理解,人的思维大致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程序。正如康德所说:“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开始于感官,由此前进到知性,而终止于理性,在理性之上我们再没有更高的能力来加工直观材料并将之纳入思维的最高统一性之下了。”<sup>①</sup>人们获取知识或真理是要经过思维自足系统的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三个递进的逻辑层次,而且理性是最高的思维能力。固然文学创作凭借的应是感性材料,“把经验作为出发点,每个人要想成为艺术学者,都必须走这条路”<sup>②</sup>;但是仅仅根据直观经验或感性知觉是不可能洞察事物的“普遍性和永远性的原则”的。黑格尔认为:“事物的深刻方面却仍不是单凭这种鉴赏力所能察觉的,因为要察觉这种深刻方面所需要的不仅是感觉和抽象思维,而是完整的理性和坚实活泼的心灵。”<sup>③</sup>只有理性思维活动,才能“打破感官事物的锁链而进到超越感官界的飞跃”,<sup>④</sup>以产生有创意的新思想。按照康德的说法,感性、知性和理性在人的自足的思维链条上是各司其职的:“通过我们被对象所刺激的方式来获得表象的这种能力(接受能力),就叫做感性。所以,借助于感性,对象被给予我们,且只有感性才给我们提供出直观;但这些直观通过知性而被思维,而从知性产生出概念。”“当我们被一个对象所刺激时,它在表象能力所产生的结果就是感觉。那种经过感觉与对象相

① 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9页。

②③ 黑格尔:《美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卷第19页,第42—43页。

④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5页。

关的直观就叫做经验性的直观。一个经验性的直观的未被规定的对象叫作现象。在现象中,我把那与感觉相应的东西称之为现象的质料,而把那种使得现象的杂多能在某种关系中得到整理的东西称之为现象的形式。”<sup>①</sup>所谓“知性一般说就是认识的能力。认识就在于被给予的表象与一个客体的确定的关系。但客体则是在其概念中结合着一个所给予直观的杂多的那种东西。然而现在,表象的一切结合都要求在这些表象的综合中的意识的统一。于是意识的统一就是惟一决定诸表象对一个对象的关系,因而决定这些表象的客观有效性并使得它们成为知识的东西,乃至于此之上建立了知性的可能性。所以,知性的所有其他运用所依据的、同时也完全不依赖感性直观之一切条件的最初的纯粹知性知识,就是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这条原理。”<sup>②</sup>“既然我们可能有的一切直观都是感性的,所以在我们这里,通过一个纯粹知性概念对某一个对象思维,只有当这个概念与感官对象发生关系时才成为知识。”<sup>③</sup>因此,“每当把一个对象归摄到一个概念之下时,对象的表象都必须和这概念是同质的,就是说,这概念必须包含有归摄于其下的那个对象中所表象出来的东西”,如同“一个盘子的经验性的概念和一个圆的纯几何学概念具有同质性的,因为在圆中所思维的圆形是可以在盘子中直观到的”<sup>④</sup>。如果说知性思维具有这种“规则的能力”,那么理性思维则具有“原则的能力”,而“来自原则的知识(就其自身来说)完全不同于单纯的知性知识,后者虽然也能以某种原则的形式而先行于其他知识,但就其自身来说(如果它是综合性的)却不是基于单纯思维之上的,更不包含依照概念的普遍性。知性尽管可以是借助于规则使诸现象统一的能力,而理性则是使知识规则统一于原则之下的能力。

①②③④ 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三大批判精粹》,第83页、141页、146页、152页。

所以理性从来都不是直接针对着经验或任何一个对象,而是针对着知性,为的是通过概念赋予杂多的知性知识以先天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可以叫作理性的统一性,它具有与知性所能达到的那种统一性完全不同的种类。”“实际上,规则的杂多性和原则的统一性是理性的要求,为的是把知性带进和自己的彻底关联之中,正如知性把直观杂多纳入概念之下并由将它们联结起来一样。”既然理性是一种原则的能力,那么“原则”又是什么?在康德看来,“原则这个术语是含糊不清的,它通常意味着一种能被作为一条原则的知识,哪怕它自己本身及根据其自身来源并不是什么原则”;“知性根本不可能获得来自概念的综合知识,而这些知识才真正是我们不折不扣地称作原则的知识”。<sup>①</sup>理性作为最高的思维方式,它具有不可超越的统摄力、涵括力和综合力,虽然它远离感性思维、别于知性思维,但理性思维的逻辑运作所获得的理性知识或思想真理却或隐或现地联系着感性思维的直观力和知识思维的规则力。具体到一个学者或作家,面对着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以及国家和社会第三种实在领域,终日里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主体思维方式去感受去体认它们,我们决不能把它们看成是“由简单的感觉材料组成的,而必须追溯它的起源”;但具备追根溯源思维力量的却是理性,只有凭借理性的无坚不摧无孔不入的穿透力、剖解力和综合力,“深入探讨它的源泉,我们才能成功地使这种实在服从于规律和理性的支配”<sup>②</sup>。以理性思维获得对这三个实在世界的总体把握和规律性认识,既有利于社会科学研究也有助于文学艺术创作。

理性是一种清醒的理智力量。理性思维的逻辑运作应似人的理智活动,越是从事智力劳动的人这种理智活动越频繁,越是

① 杨祖陶、邓晓芒编译:《康德三大批判精粹》,第200—203页。

② [德]E·卡西勒:《启蒙哲学》,第16页。

智商高的人这种理智活动的效率越高,而且迸发的理智力量越强大;尤其那些精英知识分子或才华横溢的文学家无不在理论实践或创作实践的理智活动中焕发出理性的光辉或聪颖的智慧,以一种清醒的理智力量去攻克科学难题或破译生活的密码,用不同的形式去把握内外宇宙的真面目或人生世界的真谛。但是无论什么人,对物质、精神、国家和社会运动实在世界的认知和理解,并不是时时处处都处在澄澈透明、了如指掌、正确无误的清醒精神状态中,而不少时日或不少地方是模模糊糊、朦朦胧胧,至于那些芸芸众生更不能奢谈以理智的眼光观察周围的一切和以理智的力量对待外在的一切了。因此清醒的理智力量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尤其对中国的振兴和强大极为重要,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考察和估量它的价值和意义都不会过分;即使中国有些精英知识分子或作家诗人也患有“理智力量”匮乏症,他们更需要理性的启蒙。“一旦思想的力量在人的身上觉醒,它就会不可抗拒地向前挺进,去反对现存秩序,把它召唤到思想法庭上,向它的合法资格、它的真理性和有效性提出挑战。”<sup>①</sup>思想力量的觉醒就意味着人们获得了清醒的理智力量,有了这种清醒理智力量的人就能进行自我拯救,把自己从蒙昧的昏迷的被奴役的精神状态中挣脱出来,真正认识自己、解放自己,将潜在的变革意识和创造能量释放出来,在改造客观世界或周边社会的同时也改造自己、完善自己,使自己的理智力量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理智力量从每个人身上焕发出来,或体现在科学事业或体现在文学事业或体现在一切事业上,有明显的强弱之分大小之别;就是体现于日常事物、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和自我言行的控制上也有高明与拙劣之不同。因而对每个人的理智力量的开发和使用及其所产生的实践效应,必须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予以对待,既不能抹煞人与人之间

<sup>①</sup> [德]E·卡西勒:《启蒙哲学》,第16—17页。

量的差异又不能不加褒贬地拉平所有人的理智力量,对于那些以自己的聪慧理智在事业上创造佳绩、在人际关系上和对待自我上表现出高风亮节的人就是要进行褒扬,而对那些理智力量薄弱或缺乏理智头脑的人就是要积极引导合理发掘。虽然理智力量人皆有之,特别是知识精英、作家诗人大都富有聪慧才智,否则就创作不出无愧于时代、流传百世的文学经典;但是必须指出,要获得清醒的理智力量并不容易,尤其知识分子或文人作家能够在任何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下都能保持清醒的理智头脑并在文学实践中将理智转化为一种物化的审美力量,就更加不容易了。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或文人作家在现代中国欲获取清醒的理智力量,至少应具备三个客观条件:一是以“主智论”取代“反智论”,营造一种尊重主体理性、个人智慧的人文环境和政治氛围,这对于个体知识者或作家诗人获得清醒的理智力量至关重要。二是运用理性思维的发现逻辑机制,从中外文化思潮交汇中去发现富有科学性真理性的理性意识;而这种理性既能抗拒反智主义对知识或智慧的戕害又能开发人的智力或智慧,也能为人的才力智慧的充分发挥确立正确的向度。也许正是这种理性具有排斥不正确理性和非理性干扰的功能,使主体获得清醒的理智力量。三是积极参与实践活动,固然科学研究或文学创作也是一种实践,但它却不能代替社会实践,只有把科学研究或文学创作同广泛的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从实践中验证你是否具有了“清醒的理智力量”,并且这种“理智力量”是否在科研或创作实践中转化为导向正确的建构或创造力量;同时通过实践也能出真知长才干以充实和发展已有的“清醒的理智力量”,使实践成为文人作家取之不尽的“理智力量”的源头活水。

理性是一种不朽的精神追求。根据笛卡儿的观点,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对称,即“人类身体与其他(不是身体)的物体之间的区别在于,它只是由某种肢体结构和其他类

似的偶然成分构成的,而人类心灵则不是这样由偶然之物构成的,而是纯实体。因为即使心灵的一切偶然发生了变化,使得它有着不同的理解对象和不同的愿望和感觉对象,但这并不能解释为它变成了一种不同的心灵;另一方面,人类的身体仅仅在某些部分的形状发生变化时,就会失去它的同一性。由此可见,身体可能轻而易举地被毁灭,而心灵则由于其本质而成为不朽”。他又指出:“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理解为一个思想之物,能够在思想中把自己与其他的实体区分开来,无论这些实体是思想实体还是扩延的实体,仅从这个事实就可以确定,在这个方面,我们每个人都实际上不同于其他的思想实体,不同于每个物质实体。”<sup>①</sup>且不论笛卡儿的二元论是否对称是否正确,但是他提出的人的心灵是不朽的,每个人是一个思想之物的观点却对我们有所启迪。不论人的心灵或思想都是属于精神范畴,而且由理性主体来主宰来统驭,所谓心灵之不朽实质上是说理性精神之不朽,所谓个人是思想之物实质上是说个人是理性主体,这正是他对“我思故我在”著名论断的阐释。其实,人的精神实体的构成不仅有理性还有非理性,作为一种心理机能应是理性与非理性、意识与无意识、思想与情感的共同体,尽管它们处于不同的精神层次而且又有相互冲突的一面,但却是精神实体的有机构成部分。作为一个人的不朽的精神追求,不会是非理性、无意识、情感等精神因素在起主导的决定的作用,而应该由理性、意识或思想来承担,强调心灵的不朽或精神的不朽主要指后者而不是前者。如果说人的不朽的精神追求乃是“自由”,那么“我们的自由就在于我们的理性活动之中”。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明确指出“‘理智的能力’是人类自由的关键”,正由于理性蕴含着人类的理想之光或自由之神,所以他对作

① [英]约翰·科廷汉:《理性主义者》,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第 92—93 页。

为理性的思想观念进行了严格区分,即“我们的心灵既是主动地行动又是被动地行动:当它拥有恰当的观念时,它是在主动地行动(*agit*),当它拥有不恰当的观念时,它就是被动地行动(*paieur*)”。<sup>①</sup>左右人们精神主动追求还是被动追求、是正确的追求还是错误的追求,最重要的是取决于人的理性观念是“恰当的”还是“不恰当的”。这不仅指明作为理性的观念、思想有正确与否、恰当与否之分,而且也指明人的精神追求正确与否、主动与否必须以恰当的理性作为价值理想或价值尺度。因此我们必须对支撑着人们精神追求的理性观念作出具体分析,这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文学作品的创作主体或对象主体的精神追求或审美理想也是大有裨益的。理性观念是否恰当决定着精神追求的价值取向或心理意向,因而不能从单一的视角来考察而作出全称判断,这是由于人的精神追求既是多向度的又有短期和长远之别,必须进行多角度的具体分析,虽然我们可以认定只有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理性观念才是恰当的,但这有点笼统难以把握。对于文人学者来说,要判断某一理性观念是否恰当,至少应从群体和个体两个维度来辨识。就群体来说,伦理观念恰当与否主要看它是不是反映了社会群体生活所普遍要求的公平和正义,如果只代表个体生活所要求的公平和正义那不一定是恰当的伦理观念,这是因为伦理是外在于个人的客观社会关系,集中反映了群体的权利,而这种权利有时与个体权利相一致,有时也是互相冲突的,所以判断伦理观念是否恰当首先应分析它是否代表了群体的公平权和正义权。要是真的如此,那么文学作品所表现的伦理观念就是恰当的,作家主体或对象主体的精神追求也是正确的。就个体来说,道德理性是否恰当主要不是看它是否反映了群体的自由要求和完美境界,而主要着眼于个体,因为道德是个人内在的自觉意

① [英]约翰·科廷汉:《理性主义者》,第183页。

识、自由追求和自我完善,虽然道德理性也能把个体的自由向往和群体的自由愿望统一起来,成为一种理想的公共道德,但是在更多的时候是群体的道德理性压抑或取代了个体道德理性,群体的自由追求掩盖了个体的自由向往,以群体的道德完善顶替了个体道德人格。可见,只有代表个体自由要求和人格完善的道德理性才是恰当的,而合乎群体自由追求的道德观是否恰当必须具体分析。文学作品中表现出不同的道德观念或道德精神追求,大多是传统道德理性与现代道德理性交织在一起,如果对此要作出正确的价值评判,那就必须坚持能反映出个体自由追求和人格完善的道德理性。理性作为一种精神追求几乎贯穿于每个时期的文学创作中,体现于每个文学建构的主体身上,只有精心地研究、认真地解读,才能从中总结出何为恰当的理性观念何为不恰当的理性观念。

理性也是各种原则原理、规范惯例,是一种限制或束缚自由的力量。康德所说的“理性是原则的能力”,若是指思维功能的话,那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理性思维既能根据已有原则进行推理判断,又可以在推理中创造出原则原理。如果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普遍意义,那么人们不论在何种岗位工作或在何种地域生活,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理性的原则能力”创造原则原理、制定各种规范、归纳各种惯例,或建构或改善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秩序,或创造或发展人们生存所需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然而正是人们在制定并坚持各种原则原理、规范惯例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过程中,从思想到行动却陷入深刻的悖论,这也是理性本身的悖论。追求自由是人类的天性也是终极价值,更是理性的核心,缺乏自由理性的理性是没有意义也是没有灵魂的理性,甚至成为一种有害的理性;但是人类为了社会的发展,创造更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又必须制定原则原理、规范惯例把人群组合起来,把意志